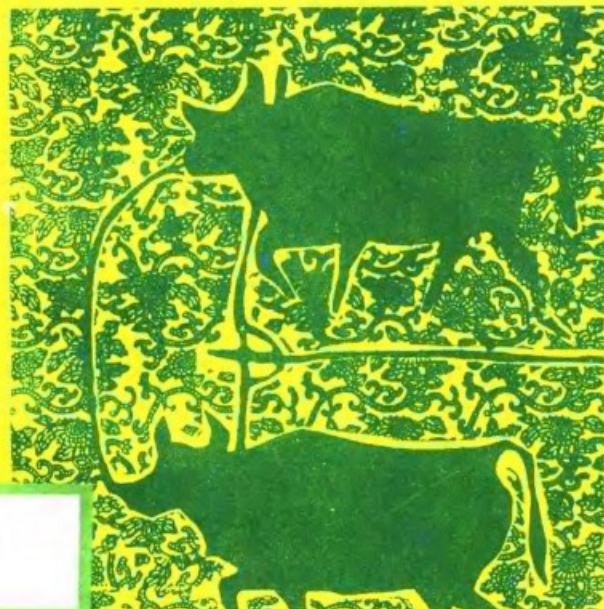


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

万振凡

吴小卫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

万暴凡 吴小卫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512093 8519894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蓝剑电脑公司照排

南昌市石泉印刷厂印刷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787mm × 1092mm 1/32 7.25印张 155千字

印数: 1~500 册

定价: 15.00 元

ISBN7-81033-814-5/F·128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目前,我省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农村经济的发展正日益显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加深对社会变革时期我省农村经济发展规律性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采取恰当的措施,正确地制定我省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今天的江西,是历史江西的延续,要正确认识当今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向,从而制定正确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就必须了解江西历史上社会变革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及其规律走向。近代一百年,是江西历史上的一个社会剧急变革时代。在此期间,江西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由封闭变为开放,社会内部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景象: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发展、新式经营的出现等等,并且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江西农村经济也一直处于曲折发展的动态之中。其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研究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发展史,揭示其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前促进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南昌大学马列部副教授万振凡、历史系副教授吴小卫主持的《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项目,是1996年经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则办批准的江西省“九五”社科规划课题;“近代中国社会嬗变时期江西农村经济研究”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课题探讨了近代江西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农业赋

税、农村手工业、农村阶级关系、农业灾害等各农村经济层面的演进过程及其规律。本书着力体现的思想是近代江西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和落后性。这突出的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农产品贸易带有明显的殖民性质及其最终破产；农业科技虽然出现了一些新成果，但并未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农业赋税日益加重，超过农民负担能力；农村手工业发展落后，还未走出家庭手工业阶段；农村阶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落后的封建租佃关系；农业灾害的周期越来越短，破坏程度越来越大。总的来看，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江西自明清以来在全国占优势地位的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和破产的过程。本书重点阐明的的问题是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本书强调近代江西地方政府政策保守，使江西在近代屡次丧失发展经济的时机，是造成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近代江西一些特殊的情况也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诸如古代交通要道地位的丧失、地理环境封闭、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田赋厘金征收沉重、缺乏工业基础等等。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抚今追昔，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尽管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发展总的来看是一部失败史，但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的阴影中徘徊。我们应当作这样的认识：江西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的结果。如今，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发展江西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我省不仅有悠久的农业生产的历史，优越的农业产品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还有历史形成的大面积的产区和优良品种资源优势。只要我们能正确地吸取历史

的经验教训,抓住时机,开拓进取,就一定能重振昔日江西农村经济在全国的雄风。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目前要加快江西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三点:要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要靠科技兴农、要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全书史料丰富、史论结合、颇有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整个研究过程得到了南昌大学科研处的关心和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江西高校出版社的周先录、罗志梅两编辑对本课题的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鼓励并对本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曹正龙、游伟平分别承担了本书第六章、第七章的撰写任务。

由于著者水平所限,其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作者 1998年8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古代江西农业发展概述.....	(1)
第一节 先秦时期江西稻作文明的奠基.....	(1)
第二节 秦汉时期江西农业的开发.....	(3)
第三节 隋唐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	(5)
第四节 宋元时期江西农业的繁荣.....	(8)
第五节 明清时期江西农业的变异	(12)
第二章 近代江西农业生产	(20)
第一节 近代江西农业生产关系演变	(20)
第二节 近代江西农业生产力发展趋势	(26)
第三节 近代江西农业经营方式的演变	(32)
第三章 近代江西农产品贸易	(46)
第一节 近代江西农产品的商品量、交易额和商品 率估计	(46)
第二节 近代江西农产品市场网络形成	(49)
第三节 近代江西农产品贸易变化趋势	(59)
第四节 近代江西农产品贸易的经验教训	(63)
第四章 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	(70)
第一节 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背景	(70)
第二节 近代江西农业科技的主要成就	(73)
第三节 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的历史教训	(82)
第五章 近代江西农业赋税	(86)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江西赋税	(86)
第二节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江西赋税的日益 加重	(88)

第三节	频繁内战中的江西赋税	(97)
第四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	(108)
第六章	近代江西农村手工业	(115)
第一节	近代江西农村手工业兴起的背景	(116)
第二节	近代江西农村手工业的发展	(121)
第三节	近代江西与沿海两湖地区农村手工业发 展比较研究	(128)
第四节	近代江西农村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132)
第七章	近代江西农村阶级关系演变	(138)
第一节	太平天国前后江西农村阶级关系	(139)
第二节	民国时期江西农村阶级关系	(147)
第八章	近代江西农业灾害	(159)
第一节	对近代江西地区水旱灾害规律的初步分析	(159)
第二节	近代江西水旱灾害演变的机理分析	(164)
第三节	近代江西水旱灾害的危害	(168)
第四节	民国年间江西防治水害的构想	(172)
第九章	近代江西农村商品发展缓慢的原因	(177)
第一节	外资经济侵略 打断优势发展	(177)
第二节	封建土地制度 束缚经济发展	(184)
第三节	田赋厘金特重 农业资金奇缺	(188)
第四节	文化教育落后 缺乏经济人才	(192)
第五节	基础工业厥如 丧失发展基础	(197)
第六节	地理环境封闭 商品经济不便	(201)
第七节	地方政府无能 方针政策保守	(206)
附录一		
1935 年江西农业统计总述		(217)
附录二		
1936 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结论		(222)

第一章 古代江西农业发展概述

在中华民族农业经济的开发史上,江西境内的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距今约九千年前,江西就已有了原始农业。先秦时期江西的先民们发明使用了多种农具,进入了犁耕时代,为此后江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江西经过数百年的开发,牢固确立了在全国的“鱼米之乡”的经济地位。隋唐之际,江西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宋元间,江西农业趋向集约化,生产日益精细与复杂,呈现出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经济作物普遍种植,江西农业开始了由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过渡,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第一节 先秦时期江西稻作文明的奠基

过去有一种说法江西在古代是荒蛮腹地,直到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开发。用史实来检验,这一论点是缺乏根据的。诸多的境内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江西古代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创造了辉煌的古代农业文明,江西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四五万年前就有人类栖息于江西。^①1962年江西考古工作者挖掘了距今约九千年的万年仙

人洞遗址,出土了夹粗砂红陶罐残片,复原后是圆底直口形罐。^②《太平御览》引《周书》说:“神农耕而陶”。农耕与制陶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该遗址还出土了扁圆形穿孔石器,据专家们考证,可能是供掘土、点播用的农具。这就说明:早在距今九千年左右,江西境内就已存在原始农业。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江西的生产开发地区更多了,形成了许多居民聚落点,已经发掘的遗址多达五六十处,广泛分布于鄱阳湖湖滨,赣江中下游地区。距今约五千年的修水山背文化遗址,^③出土的石器农具有石铤、石斧、孔石刀等,这些适宜于掘土,收割用的工具的进步,反映了种植业已比较发达。山背遗址中还出土了稻谷壳、稻秆。同时期的樟树樊城堆遗址^④、永丰县尹家坪遗址^⑤和萍乡市郊区新泉、赤山遗址^⑥中也有稻谷、稻秆发现。它们证明:江西种植水稻的生产,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十分普遍。

江西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发展速度加快,生产开发区不断扩大,居民点日益增多,现已发现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约 200 多处,分布在 40 余县市之中。樟树市吴城遗址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文化遗址,^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江西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吴城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斧、铤、刀、镰等,陶器出土的主要有鬲、甗、鼎、豆、罐、尊、盂、碗、爵等,青铜器出土的主要有斧、铤、凿、刀、戈、矛等。这说明当时这里既是一个水平很高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江西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人口稠密区,有一大批专门从事手工制造的劳动者群体,还有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水平。九江县新合乡神墩遗址出土了商代水井一口,^⑧内有木耜 1 件,长 88 厘米,这是目前全国仅见的珍品。《易·系辞下》说:“神农氏

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为木柄部分，耜为起土部分。使用耒耜翻地，比使用石器前进了一大步，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很有利。在南昌、奉新的商周遗址中，各出土了一件青铜耜，在南昌、萍乡的商周遗址中又各出土了一件青铜铲。^⑨数量虽少，却反映了青铜农具使用的广泛程度，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尤其值得提出的是 1989 年新干县大洋洲商墓的发掘，^⑩发现数量众多的农具和手工工具。青铜制造的铲、犁铧、镰、铤、斧、凿、锥、砧、刻刀和靴形器计 120 件。手工生产用的铜凿有大小三种，农具中的犁铧 3 件，铲 13 件，镰 5 件，耜 2 件，合计 23 件，是全国空前的大发现。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商代铜犁出土。从这一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江西至少在商代中期已经进入了农业的犁耕时代，这在目前全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先例。从原始农业发展至后世农业经济，牛拉犁耕是发展的关键环节，商代江西先民犁耕的使用，不仅为整个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也直接为秦汉时期江西农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秦汉时期江西农业的开发

秦汉时期，江西农业开发，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

首先是赣江与大庾岭的开通。秦始皇三十三年，为降服南方越人，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人守五岭”。^⑪秦军“一结余干之水”，把守武夷山隘道，防备闽越的反抗，同时控制江西境内的水运干流，顺利地将军需物资沿赣江南运；“一守南野之界”，据守大庾岭。南野范围包括今南康、上犹、大庾诸县。通过扼住大庾岭要塞，秦军可把经赣江、章水运来的粮

饷物资,由大庾岭山路运入广东的南雄和番禺。在这个过程中,几十万北方军民留在南方,与土著越人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当地。江西境内既有两路秦军驻守,自然也有中原的百姓前来屯戍,补充了新的人口,开垦出新的地区,随着秦军向前推进,赣江水道被利用,大庾山路被开通,江西与南北的通途打开了,这就为江西经济的开发开辟了道路。

其次是人口的增加。西汉开始对全国各地的户口实行登记,有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完备的人口统计资料。西汉时江西境内设县 18 个,归豫章郡管辖。据《汉书》、《后汉书》,公元 2 年、140 年江西人口分别为 35196 人、1668906 人,净增人口 131694 人。同时期全国人口减少,而豫章郡增加极多,在全国各郡中的位次,由第 53 位跃居第 4 位。人口数量大增,意味着劳动力大增,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反映,又是发展社会生产的力量所在。

第三是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春秋至秦汉,江西境内铁农具出土地点很多,遍及全省 20 余县。1964 年修水县古市汉墓出土的铁农具比较有典型意义。^⑫在 19 件农具中,镢的器身较小,比较单薄,一般高 6.6~7 厘米,刃宽 7~9 厘米,是适用于中耕的典型农具,墓中农具以镢的数量居多,可能是当时重视中耕除草的反映。农具的多样化,专门化利于农业生产向精耕细作发展。恩格斯说:“铁使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开垦广大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⑬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加快了江西境内农业的开发步伐。

对于开发时期江西的社会生活情景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有人

据此认为江西秦汉时期的开发方式是原始的。这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既然“火耕水耨”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式,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还能过着“不待贾而足”、“饭稻羹鱼”的富裕生活?唯一的解释是:在当时火耕水耨与铁犁牛耕是互相补充的。在地势较高、土壤含水量适中的农田,普遍是使用犁耕。对荒山丘陵,低洼湿地,火耕是犁耕的前奏,先烧去荆棘杂草而后开耕。特别是在荆棘丛生、杂草遍地,又处于江南水乡的自然条件下,放火烧荒是简便而适宜的开垦土地的方式。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高,复种指数提高,排灌条件的改善,烧荒便相应减少,牛耕犁耕在不断扩大。

经过先民们的辛勤开发,江西“鱼米之乡”的经济地位,在汉代基本确立。江西各地汉墓中有很多陶仓出土,粮仓进入平常百姓家庭,这是水稻农业发达,江西米谷富有的有力证据。诸多文献资料的记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汉书·严助传》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表明当时余干、鄱阳一带是重要的产粮区,具有战略意义。《后汉书·安帝本纪》载:东汉安帝永安元年,调豫章等郡米谷接济东郡、济阴等六郡国。永初七年再调豫章等郡租米赈给南阳、庐江等郡。史实说明,从东汉开始,江西就是调出粮食的余粮地区。

第三节 隋唐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有 300 多年社会安定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步,江西农业经济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农业劳动力的增多。隋唐时期江西人口增多的情

况见下表:

隋唐间江西户口数量变化情况表

	隋大业五年 (公元 609 年) 户 数	唐贞观十三年 公元 639 年		唐天宝元年 公元 742 年		唐元和年间 (公元 806~820 年) 户 数
		户 数	口 数	户 数	口 数	
江 西	85638	69240	319047	248547	1636257	293180
全 国	9070414	3041871	12351681	8973634	50975543	2368775
江西 占全国 %	0.94	2.27	2.58	2.76	3.20	12.37
资 料 来 源	《隋书》卷 31 《地理志》	《旧唐书》卷 40 《地理志》		《新唐书》卷 41 《地理志》		《元和郡县志》 卷 28

由上表可知:从公元 609 年到公元 820 年约 210 年间江西的户数增加了 3.42 倍,净增 20.7 万余户;从公元 639 年至 742 年约 103 年间,江西人口数增加了 5 倍以上,净增人口 131 万 7 千多人。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特别是江西人口数在全国的比重,呈稳定增长之势,到唐元和年间,占全国户数总数的 12.37%,这个比率在全国各省中也是较高的。人口的众多既是江西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也是当时江西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隋唐时期江西农业发展的第二个标志是新式农具的使用。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说:江东地区普遍使用“曲辕犁”。江西的饶州、信州属于唐时的江东范围,所以唐时江西的饶、信、抚、洪等州也可能使用了先进的曲辕犁。曲辕犁最大的优点是节省人力畜力,便于丘陵山地的垦种。唐代江西信州、吉州、饶州数以万计的丘陵山地被开垦出来,如果没有曲辕犁的

使用,是难以实现的。

唐朝人陈廷章在其《水轮赋》中描写了江西临川等地使用高转筒车的情形。他说这种水轮装置在溪河边,“虽破浪于川湄,善行无迹,既输流于波面,终夜有声”。这种高转筒车能够“钩深致远,沿洄而可使在山,积少之多,灌输而各由其道。”进而达到“低徊而涯岸非阻,委曲而农桑是训”的效果。江西各地溪流河道众多,丘陵地形使水流湍急,筑以陂堰使水流集中,增大了冲击力,更适宜于安装小轮筒车,使高于河岸的稻田获得灌溉用水。

隋唐时期江西农业发展的第三个标志是水利工程的广泛兴修。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水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这一方面为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极易造成水灾,特别是春夏之交的梅雨季节,江西湖泊往往泛滥成灾。为了化害为利,唐代江西人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广泛地兴修水利事业。据史料记载,赣江上最早出现的防洪大堤,兴建于唐高宗永徽年间,位于丰城县境内,“沿江十余里,筑堤防水护田”。^⑭此后江西各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主要的水利项目有:元和年间韦丹在南昌修建的防洪大堤,会昌元年何易在建昌修建的建昌河堤、长庆二年李渤在九江修建的甘棠堤、建中元年李复修建的鄱阳郡父堤、武德五年周法猛在临川修建的建述坡、大历年间颜真卿在抚州修建的建土滕陂等共60多处。^⑮这些水利工程,兼备防洪排涝,防旱灌溉,航运养渔之功效,对推动唐朝江西地区的农业发展,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隋唐时期江西农业发展的第四个标志是土地垦种扩大,农产丰盛。关于唐代江西土地垦种扩大的盛况,史书多有记

述。如《广舆记》卷十二说：刺史裴倩在信州招抚流亡垦地，“辟田万顷”。唐代宋、宪宗年间洪州由于“田野辟、户口增”，^⑩先后分出新城、孝悌、靖安三县。对抚州，唐人张保和的评价是：“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阡阡，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岫之支，豪华接袂，”^⑪一派繁荣景象。江西水稻生产的情景，诗人是这样描写的：“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⑫《册府元龟》说：“江西、湖南地称沃壤，所以尝倍他州。”《唐大诏令集》也说：“江西，湖南管内诸郡，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另外江西的茶叶产量也十分丰盛，《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梁县下记：“每岁出产七百万驮，税十五万余贯，”是全国最大的茶叶产地。

第四节 宋元时期江西农业经济的繁荣

宋元时期，中国北方战乱频仍，而江西相对稳定。大量的北方居民南迁江西，不仅使江西农业劳动力大增，而且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的农业出现了全面的繁荣。

1. 人口的空前增多。根据《宋史》卷 88 地理四记载，北宋崇宁元年(1102 年)江西十三州军的人口数为 4459547 人；据《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江西西路(不辖江、饶、信州和南康军)的人口数为 4958291 人；据《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江西的人口数高达 58834711 人。到元朝至元年间，江西的户口在全国总户口数中的比重高达 20% 以上，口数占近 1/4，超过了全国其他地方。这在江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无来者的。人

口的空前增多为农田垦辟,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2. 梯田广泛垦辟。江西地形丘陵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2%,适宜于梯田的垦种。对丘陵山地的垦殖,从唐代就已开始,宋朝以后,范围不断扩大,面积日益增加,垦辟的地点逐渐向丘陵山地的深远部发展。如曾安止在《禾谱》一书写道:北宋太和县“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当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清楚地说明了太和县山区迅速被开垦的形势。南宋以后,垦种梯田更加广泛。杨万里淳熙五年过永丰县境,见山间耕地如带,层层而上,赋诗并序曰:“过石磨岭,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其诗写道:“翠带千环束翠峦,青梯万级搭青天,长淮见说田生棘,此地都将岭作田”。^③乾道末年范成大经袁州,记其行曰:“岭板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④绍兴十六年张成上奏宋高宗说:“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上资水利以为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干旱”。^⑤据《文献通考》载,宋元丰年间江南西路官民田地有452000顷,超过了当代的江西耕地数,可见宋代江西土地开垦的极盛程度。

3. 水利工程普遍兴修。隋唐时期江西水利工程的兴修主要集中于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县治所在地。宋元时期江西的水利工程是随处可见,而且工程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灌溉的面积动辄在数万亩以上。如洪州章江:“作石堤二百丈,高五丈”。^⑥丰城江堤十余里,全用石块砌成,“凡三级,级高一丈”。^⑦清江破坑堰“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⑧安福“筑堤潴水灌田一万二千亩”。^⑨宋元时期江西水利建设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除了在江湖边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外,为了保护梯田,在山区、丘陵地带也兴修了无数的小型陂、塘、堰,以灌溉梯田。赣西的袁州,在两宋时期就“引仰山水至郴

城,灌田二万亩”。^④上高在南宋嘉熙年间“筑陂堰以利灌溉”。^⑤抚州在熙宁年间“坡水多及高平处”,^⑥导引高山溪水灌溉梯田,使高处农田也可种稻。

4.农作物种植品种增多与耕作技术的改进。首先是水稻品种的众多。曾安止在《禾谱》一书中记录了吉太盆地的水稻品种达44种,说明当时江西人民已经掌握了根据本地气候、土壤、水分等条件,选择和培育适宜水稻品种的技术。其次是麦的种植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在南宋绍兴初年,甚至出现了江西农村麦田“极目不减淮北”^⑦的兴旺现象。其三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南宋临川艾可信《木棉》诗写道:“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三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由此可以断论南宋之际,临川一带已开始种植了木棉。元朝大德四年,著名农学家王桢曾在信州提倡种棉。此后江西许多州县都有棉花种植。元至元二十九年,中书省命江西“于课程地税内折收木棉白布,已后年例必须收纳”,^⑧说明江西植棉范围已有较大扩大。其四是栽桑养蚕遍及州县。据有关史料记载,从北宋开始江西十三州军普遍栽桑育蚕,蚕丝业在江西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四是柑橘的广泛种植。北宋年间,江西的洪州、抚州、临江军、吉州、赣州、南安军等地的柑橘生产,已有相当的优势,这在士大夫的诗文中常有反映。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写道:“金橘产于江西,……价重京师”。范成大在《骞鸾录》中描写江西种橘盛况说:“带江悉是橘林”。其五是出现了专业化的渔业生产。洪迈在《夷坚志·廖氏鱼塘》中写道,雩都县廖氏“所居有两塘、各广袤二十亩,田畴素薄,只仰鱼利以资生。……每岁获直不下数百缗”。这是一个典型的养鱼专业户,反映了养鱼业的发展程度。其六是双季